

《二十一世紀》與二十一世紀 的世界

趙鼎新

《二十一世紀》創刊至今的三十年中，世界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三十年前，柏林圍牆被推翻，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而在今天，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卻都在不同程度上經歷了包括國家分裂、內戰、大規模族群衝突、經濟衰退、社會保障體系崩潰等磨難，並在目前仍然陷於政治腐敗、各種傳統地方勢力復興、經濟發展緩慢、各種非理性保守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宗教盛行等困境而不能自拔。三十年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慶祝着「歷史的終結」，但在今天，宗教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強人政治在印度、土耳其等重要的非西方民主國家中愈演愈烈，同時歐洲國家也在外來移民「消化不良」、難民危機、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經濟衝擊等壓力下大規模地朝「右」轉。三十年前，美國的軍事實力和軟實力在世界上都達到了頂峰，但今天的美國則在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與伊斯蘭國戰爭的拖累下，再加上新自由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下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國外轉移等原因，多方面實力明顯下降。而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簡直就是歷史對美國的報復：他當選總統後在國際上大搞單邊主義，自行放棄了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在國內我行我素，任人唯親，加劇了美國的種族矛盾和政治分裂；在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中進退失據，致使美國感染率長期高居不下，死亡人數高居世界榜首，同時為了推卸責任又到處「甩鍋」；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在選舉年為了取勝而不顧一切的種種做法，不但使得美國的軟實力遭受重大損傷，還給美國民主帶來了一些很可能是不可逆的損害。

世界局勢發展到今天這一步，美國負有很大責任。回頭看，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顯然不是歷史使然，而是美國在國際政治上佔據絕對主導的結果。固然，那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壓力下走向多黨民主制的國家和地區，在當時都面臨着各種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可是，「夾生飯」一樣的多黨民主制不但沒能解決原來的問題，還帶來了大量新問題，其負面效果與前蘇聯「輸出革命」的後果可以一比。美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期間對世界各國

進行了更多的干涉，在「9.11」恐襲之後更是直接派兵佔領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從而放棄了主要是靠制訂、推廣、維護和改變「規則」，再加上武力震懾而獲取的對他國主宰的「間接帝國」傳統，這不但使美國陷入了各種困境而不能自拔，而且還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一系列的危機，由此造成了自由主義和理性精神的影響力在世界上大規模下降，以及各種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保守勢力在許多國家影響力的遽升。在當今世界，啟蒙運動後強大起來的理性精神，以及除了民族主義之外的所有世俗意識形態，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力其實都在大幅度下降。但是民族主義從來就沒有產生過自己的思想家和思想體系，因此它必須和時下的強勢意識形態接合才能產生力量。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曾經被民族主義青睞，而在今天，保守的宗教力量和非理性的力量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成為了民族主義的新寵。可以說，人類社會正面臨着啟蒙運動以來最大的思想危機，並且這一危機還會持續很長時間，而美國作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主要推手在這一危機面前難辭其咎。

在這一片混亂中，中國一些感覺良好的民族主義者似乎從中國看到了希望。的確，中國在當今世界應該說是一個最大的異數。中國是唯一頂住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大國，並在經濟上獲得巨大成功。今天的中國不但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普通民眾的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的車愈買愈好，房子愈住愈大，出行愈來愈方便，海外留學人數連續幾年佔世界榜首，海外旅遊在2018年達到近1.5億人次。這些不爭的事實都說明中國普通家庭的財富和可支配資金是絕不能用家庭平均個人月收入這類資料來衡量的。同時，經濟成就還給中國普通民眾帶來了視野的開闊、自信心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樣化，以及對不同生活方式容忍度的提升。對中國有深入了解的人應該都知道，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在個人財產和隱私保障、各種社會邊緣群體的保護、性別平等和對不同性取向的社會認可、藝術創作和表達形式的多樣性等多個方面的進步其實都非常快。中國的「上升」和美國的「衰弱」使得有人開始確信「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但這種想法同樣天真。

我並不是說二十一世紀一定就不會是中國的世紀。二十一世紀的路還很長，中國也畢竟是一個在地域、人口、資源和內部文化認同感整合上都具有明顯優勢的大國。我這兒是想強調，由於受到五個結構性困境的限制，中國至少在近期內並沒有能力以任何方式來改變當今世界的大趨勢。

第一，當前的中國拿不出一套既不同於自由主義，也不同於目前正處於上升軌道的各種保守主義，並能取得外部世界相當程度認可的價值體系，而一個缺乏軟實力的國家是很難在世界上取得主導地位的。



第二，中國經濟雖然強大，但卻並不具有很強的科技原創力。科技原創力需要的是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和市場需求的有機接合。中國目前在官僚體制主導下的高投入、低產出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也許有可能會讓中國在某些現有的技術領域趕上甚至是超過西方，但是，舉國體制同時也會大大削弱科學家作為一個整體的原創力，從而減低了中國率先在科技上實現範式轉換的可能性。前蘇聯就是我們的鏡鑒：它在「追趕」西方電氣和化學工業上做得相當成功^①，但在新興的生物和資訊技術上則完全「摸不着邊」，導致它在和美國的科技競爭中完敗。當前中國的官僚似乎已經完全忘卻了這一段歷史。問題是，沒有強大的科技原創力，談何領導世界？

第三，在內政上，雖然經濟成功給普通民眾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中國卻沒有在經濟成功的同時，解決好任何一個走上了被動現代化道路的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三大問題：如何在開放社會中建立一個能長治久安的現代執政基礎；如何拉開政體和政府的距離，使得執政的具體得失不會影響政體的穩定；如何建立一個既符合現代性要求又能適應本土文化和社會結構的核心價值觀。只要這三大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由此所引發的大量「內耗」就會耗費中國政府大量的精力。

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美國確實面臨着各種危機，但說美國已經失去了世界霸主地位則是言過其實。美國有着巨大的人口和遼闊的疆域、近於殘酷但卻具有高度創造力的文化、佔絕對優勢的軍事技術，以及作為霸主所特有的多種轉嫁危機的手段和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從近代國際關係史所提供的各種案例來看，一旦中國被美國認定為是對其霸權最具威脅的國家，除非中國的政治家有大智慧，否則很容易被美國所主導的競爭拖垮。

第五，雖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世界範圍內已經退潮，但在西方國家中，「民主自由」話語依然具有絕對的政治正確性。因為中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期間堅持了威權主義，使得「民主自由」話語在反對中國威權統治的圈子中也仍然有較大的市場，並能得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支持。這就是為甚麼即使香港的「反送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出現了大規模的騷亂和暴力，顯露出了嚴重的偏執、保守和不容忍精神，該運動仍然得到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強力支持。總之，香港、台灣甚至南海問題在很長時間內仍然會是美國壓制中國的王牌，中國在這些問題上也難免不被帶着節奏走，繼續處於被動位置。

歷史還告訴我們，一個能在未來改變世界大格局的國家往往是在今天沒有受到霸主充分注意的大國。當今世界上大概有五個國家目前處在這個位置，但是土耳其和印度更處在前沿。首先必須承認，這兩個國家在當前都受到一些中國所沒有的問題的制約：土耳其最難的就是如何在周邊的穆斯林國家中建立起信任和領導地位，而印度最難的則是如何在一個文化、宗教、語言方面存在很大差異的，由多個邦國和部落所組成的「帝國」框架下，建構一個基於印度教的民族認同。但是與中國相比，這兩個國家至少有三個方面的

優勢：它們都有既能堵住西方人的嘴，又不影響它們推行宗教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和強人政治的「民主」體制；都有社會滲透力很強的宗教作為國家的核心價值觀；都有中國和俄國擋在前面，為它們的發展「做掩護」。但話說回來，這兩個國家要形成與美國抗衡的力量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即使有朝一日它們擁有了這種能力，其後果只會強化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把我們真正帶入到了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所說的「文明衝突」時代。

世界發展到今天一步，並且一切來得這麼快，應該說我們都沒有預料到，至少沒有完全預料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群體至少應該有所反省。三十年前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初期，我們難道不是在慶祝着共產主義和法西斯的崩潰是二十世紀的最大遺產，信心滿滿地宣傳自由主義線性史觀，並試圖從經驗上來論證後現代價值趨同論、民主和平論以及民主浪潮波浪性前推論等意識形態的正確性？三十年前的今天，我們當中又有多少人能清醒地看到「自由」其實只是一個舞台，而不是舞台上雋永的「明星」，並且清楚地認識到「自由」這面旗子如果掌握在國家的手上，照樣也可以成為為非作歹的武器？從這個角度講，當今世界局勢難道不是我們知識份子鼓掌拍手推出來的嗎？

知識份子身上有許多「職業病」，而一旦手中握有權力，只會把這些毛病放大。我們因為很少處理實事而頭腦簡單，我們會在「理想」的引導下不斷放大各種有利證據，我們會因為邏輯能力很強而把觀念推理成「事實」，我們更會因為過於想把自己的理想轉化為現實，甚至是出於各種世俗目的而附庸權力，特別是國家權力。要讓知識份子直面現實，或者至少變得無害，不同思想之間的交流和制衡最為關鍵。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一世紀》雜誌在我的心中一直佔據着特殊地位。雜誌誕生之日，正值我決定改行攻讀社會學系博士之時。我先是它的讀者，後成為它的作者，對它懷有一份別樣的情感。在我的眼裏，《二十一世紀》是華人世界中最能容納各種思想、觀點、題材和文風的一份學術雜誌，一個非常難得的讓各種思想交流衝撞的高端平台。我希望《二十一世紀》能在這紛亂的世界中繼續為大家提供一片淨土，引領着我們接受多元、堅持理性、直面現實。

註釋

① 需要提醒的是，前蘇聯在某些科技領域的成功也並不完全是舉國體制的結果。前蘇聯全盛時期，超越民族的共產主義信仰在世界上有很大市場，因此會有西方世界左派知識份子願意充當前蘇聯的「第五縱隊」，為其核心技術的發展作出貢獻，但今天的中國完全不具備前蘇聯的條件。對於當前中國來說，一旦美國對在本國工作的華裔學者和工程師實施限制，核心技術的發展就主要得靠自己了。